

2009年8月
(第8期,总第148期)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Aug.,2009
(No.8,General No.148)

【历史纵横】

昙花一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运动

——以《新社会》旬刊为中心

曹小娟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五四”运动前后，社会改造运动波诡云谲，知识分子被有所期待地推向社会的中心。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他们提出“文化”改良方案，然而焦灼的心态、士大夫的依附心理以及自我解构的启蒙悖论最终导致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文化”救国的美好愿望，短暂的文化联盟风流云散。

关键词：社会改造；启蒙悖论；《新社会》旬刊

中图分类号：K203；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9)08-0030-05

从传统的“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逐渐边缘化，但文化影响力却“从晚清到1930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1]文化影响力的过度膨胀以及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作祟，促使知识分子在文化运动登峰造极之时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运动。本文试图通过第一份社会学杂志《新社会》旬刊来进入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去探究思想改造、文化更新等社会方案背后的知识分子心态，并追寻中国革命最终走向的内在原因。

—

《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创刊于北京，由北京“社会实进会”出版、发行，共出19期。主要编撰者有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张晋、王统照、宋介等，初为4开小报，1920年起改为16开本薄册，1920年5月1日出至第19号时，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北京“社会实进会”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的一个社会团体，它成立于1913年，由参加青年会活动的大、中学生发起组成，有会员200多人。该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作风”^[2]为宗旨，举办演说会、游戏场等社会服务活动。1915年该会内设学务、演说、游艺、调查、交际5个部。1918年秋，又增设编辑部，先后约请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和瞿世英、许地山为编委，并由郑振铎担任编辑部部长。郑

振铎热爱俄罗斯文学，经常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阅读俄罗斯小说，与当时的青年会学习干事孔某成为朋友，后青年会有意出版一本供青年阅读的周刊杂志，因此就约请了郑振铎，这才有《新社会》旬刊的诞生。

中国古代文史哲没有分家，“士大夫”著书立说大多局限在治国方略，注重“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贤能君王”，他们没有社会的概念以及社会学的知识。而到近现代社会，“风雨如晦”的社会现状迫使知识分子不得不研究社会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国人亦艳羨西方井井有序的学科规划以及“专”的学问，因而西方的社会学引起了国人的重视。《新社会》旬刊是中国最早的一份专论社会学的杂志，《发刊词》开宗明义：“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3]在出版了两期之后，郑振铎与耿济之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建议更改体例，变作适合“工商界”阅读的通俗报纸，但郑振铎认为中国人素来不注重“社会”一方面的学问，因此《新社会》要做传播社会学的机关，登载有关“社会研究”的著作^[4]。《新社会》同人旨在向国人传输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希望藉此以改变社会现状，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在于社会改造，而社会改造的程度则体现了文化运动的效果，如果大多数人能习得一些有关社会的知识，社会改造就会顺利很多。

收稿日期 2009-07-20

作者简介：曹小娟(1981-)，陕西泾阳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现代文学。

这份具有浓郁研究色彩的社会学报纸一经刊行就迅速引起广泛的关注,《新青年》认为“《新社会》是现在一个最具有进步最切实的杂志。”^[9]《新社会》自第6号开始“改订册本”,7号明确表明“销路虽广”期待“扩充”。8号许地山加入编辑部,11号又增添北大的郭梦良和徐其湘两位,16号《本报启示》中赫然写道:“本报自出版以来,销路日广。近来订报的人更多。但他们多愿意从第一号定起。本报所存的报无多,第一,七,十一各期,更一份没有了。希望代派处诸先生见此启示之后,即将销售不完之报,即速退还,以应急需。至要!至要!”^[10]如果这种夫子自道存在自我炒作之嫌,那么透过这份杂志中刊登的广告我们亦能看出它在当时走俏的状况。9号之前,《新社会》刊登的广告仅限于书报杂志类,诸如《新青年》、《新教育》、《平民教育》、《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工学》、《学生旬报》、《解放与改造》等等,大多以非盈利性质的交换广告为主。1月17日职员特别会上讨论了刊登广告的事宜,并全体通过了萧元恩所拟的广告价目表,随之第9号刊登了“美国友华银行的特别通告”,约占六分之一的版面,这是《新社会》第一个盈利性质的广告,到第10号,这个广告就扩大到二分之一的版面。从13号起到停刊,《新社会》几乎每号都有两个半版面以上的广告,最多的一号达4个半版面,其上登载的广告主要有:“茂生洋行广告”、“解放与改造”、“通俗周报”、“英国鄧禄普橡皮厂”、“美国照相公司广告”、“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广告”、“北京花旗银行”、“美国汽车”、“美国友华银行广告”、“公记印书局广告”等等,广告的渐次增多说明了刊物的畅销以及社会影响力的增强。

《新社会》旬刊最初的销售网点有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温州、日本等,后来又增加了吴淞、长沙等地,到被迫停刊前,其传播面可达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它确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然而它的走俏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论背景,它是北京社会实进会隶属下的一个小刊物,论编辑,他的编辑阵容并不豪华,郑振铎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瞿秋白、耿济之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他们都是刚刚20出头的青年学生。而且,刊物的撰稿人大多是编辑本人,外稿很少。宣传社会改造思想与方法以及对时下社会动态的敏锐把握是它畅销的主要原因,他们改造社会的理念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宏图伟业”。

二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秉承着新时代“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当时西方的一些理论如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

的空想社会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等都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新社会》同人改造社会的方案都源于这些理论以及社会学说,多元化的借鉴与吸收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确立之前理论的庞杂与混乱,从中可以窥知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改造的特点以及最终撷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这个时期的社会改造运动具有鲜明的特色(一)理想主义。“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运动抱有无可比拟的乐观态度,他们大都服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将生物进化论转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因而他们相信理想中的“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肯定能变为现实,这种自信更基于他们对科学主义的信任。《新社会》同人认为他们的社会改造运动“是研究的一一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11]他们借鉴了很多社会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之所以受到《新社会》同人的吹捧,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科学考察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理论。互助论最早由俄国博物学家凯斯勒(Keisler)提出,克鲁泡特金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察,阐释了“互助”理论,并将它作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根基。互助论在清朝末年已经传入中国,当时的天义派以及新世纪派都曾经鼓吹过“互助论”,蔡元培、李大钊、孙中山等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然而直到“五四”前后“互助论”才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即所谓的工读互助运动。他们亦尤为推崇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的“同类意识”,郑振铎认为:“凡是同种的动物,都有一种‘同类意识’”^[12],并将吉丁斯的《社会学原理》介绍给国人。吉丁斯是美国心理派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受到孔德的实证主义以及斯宾塞进化论的影响,他主张用归纳法研究社会现象,认为个体会因共同的刺激、联想、模仿等发生相同的情感,即“同类意识”,这无疑也被看作是科学的社会学说。此外,《新社会》同人还做了大量相关的社会调查,比如第1号郑振铎《北京的女佣》、第4号林斯陶《首善第九工厂调查记》、第8号瞿世英《调查贫民收养所的报告》等。总之,科学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让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事业充满了信心:“因为信仰为万事成功的基础,我‘信’吾们一定能够战胜罪恶和黑暗,我‘信’,将来社会一定能够改进。”^[13]

(二)高蹈的文化至上主义。林毓生认为中国第一、二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一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9](P43)}这的确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瞿世英在谈及妇女解放时将学问与知识列在首位:“你们不想解放则已,如果要解放自己。第一步便是要求学,没有学问和知识是不能进步的。不求知识而言解放者,是一定没有效验的。”^[10]而且他认为改良社会的根本方法便是去“提倡平民教育——文化运动”^[11]北京社会实进会开办的一系列露天学校、演说

会、夏令补习班、平民夜校等等都是践行文化改良的具体行动。文化改良思路的产生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原因可追溯到晚清,从晚清开始的社会变革运动如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的逐一失败,让当时的仁人志士清楚地认识到仅仅凭借政体的转换并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开启民智”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随之,政治领域的改革波及到了文化领域,新文化运动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同时亦催生了文学革命。巨大的文化转型将一批失去政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推向社会的中心,使得他们在文化领域内的地位骤然上升,随之以思想文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油然而生。

晚清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以及在野的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与晚清政府以及章太炎、刘师培与辛亥革命等,这一批知识分子延续着古代“士大夫”的仕途经济及“入世”精神,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留洋归来以及国内大学培育出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文化领域,他们发起的社会改造运动与文化、思想具有亲缘性,而与政治保持了距离。北京社会实进会由学生组成,该会“完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慕虚名,也不靠着‘他力’”^[12],它的资金来源以筹款、募捐为主,露天学校、夏令补习班、演说会等需要的教员以及工作人员都是义务性质的劳动。王光祈1919年底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反对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冀图以改造生活、复兴文化、音乐育民等手段来实现社会改造的目标,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初衷是自发地组织乡村,不接近政府、依靠政府!总之,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奉行文化至上主义,他们信心十足地以为思想、文化的变革能解决所有的现存问题。

(三)集体的民主主义。刘军宁认为:“无可否认,《新青年》对个人的再发现,奠定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然而,不幸的是,不论是春秋之‘存我为我’,还是五四之‘个性解放’均被随后到来的排山倒海的集体主义,淹没得无影无踪。”^{[13](P209)}“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鼓吹个体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传统家族观念、群体意识的蛊惑而又不断地将个体融入集体之中。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注重“群体”而非“个体”,因而中国知识分子更为强调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而非以“个体”为根基的民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卢梭式民主思想的内在原因。唯一与传统不同的是民主的主体从精英转换为下层民众,正如张灏所言,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追求的民主是一种全民主义,舍弃传统的“君子小人”而以“人民大众”来代替传统精英:“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输入中国以后,这种全民主义演为一种在政治上认同一般低下层劳苦大众的意识,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14](P234)}《新社会》旬刊《发刊词》中明确写

道:“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15]瞿秋白言:“从前中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新政,庚子以后的新政,辛亥革命,几次几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因为总带着‘君子小人’主义的色彩。现在‘德莫克拉西’到了中国了!革新的时机真到了!”^[15]因而他号召大家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实施平民教育。郑振铎亦认为:“‘社会服务’的工作,就是从一般平民身上打算的,就是从实际上使得平民觉悟的。俄罗斯革命的成功,人家说是列宁们的功绩,我却说是虚无党十年来改变方针,鼓吹农民的效果。”^[7]而且在他看来,社会服务就是“下层的大多数的新文化运动”。^[16]中国近代民主之所以会转到下层民众身上,就在于下层民众的觉悟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至关重要,而俄国民粹主义思想、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无形中又加强了知识分子固有的“民本”思想。

(四)关注劳动问题。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关注劳动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对象是下层民众,那么劳动问题自然是当时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劳动问题也日益被凸显出来。瞿秋白在《新社会》旬刊第4号《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一文中首先发难,提出“劳动问题”,当时的一大批学者并不认可中国会产生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冲突问题,李大钊早年也认可这一观点,正如瞿秋白在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没有大地主和大工厂。然而他们逐渐改变了这一观念,转而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侵略下,中国必然产生劳动问题,这是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知识分子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原因。不过当时的瞿秋白并未完全了解并服膺马克思主义,因而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使劳动者获得“科学的知识”与“求学的机会”。^[17]《新社会》17、18、19连续3期专门讨论劳动问题,16号《本报启事》中预告:“本报拟以十七、十八、十九三期,专讨论劳动问题,欢迎大家投稿。”^[6]后这三期如期出版,从中可以窥知《新社会》同人解决劳动问题的思路,大约有两种方式:1.推翻雇佣制度以解决劳动问题。郑振铎、瞿秋白等人持这种观点,郑振铎在《什么是劳动问题?》中认为:“欲谋根本解决,不再雇佣状态的增进,而在雇佣制度的推翻。现在世界上大数的劳动者都有这种觉悟了!”^[18]2.从道德完善的角来解决劳动问题。许地山认为:“资本家道德的觉悟,大可以促进产业底分配,和社会底幸福。”^[19]姑且不论这两种方案的优劣,但是他们对劳动问题的关注可见一斑。此外,他们还非常关注大型的国际劳动会议以及各国劳动者的最新动态,并且身体力行做各种社会调查。

这些特征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致命

弱点，他们希冀以思想文化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对科学的过度崇拜激发了他们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他们后期的剧烈转变亦说明了文化改造思路的虚妄性，而对集体民主主义的确认以及对劳动的问题的关注却又显露出知识分子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端倪。

三

1920年5月1号《新社会》旬刊出至第19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北洋军阀查封，19号《郑振铎启事》中还写道：“本报发出十九号的要目。预告里，有我的一篇《劳动运动的历史的观察》。现在我很忙，恐怕不能做了。谨向读者告一个罪。在二十一、二期，或者可以赶做登出。”^[20]对此，瞿秋白认为：“虽然如此，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21] (P248)}8月5日，在《新社会》同人的积极争取下，又创办了《人道》月刊，作为《新社会》旬刊的继续，尽管《人道》的色彩有所缓淡，但青年会方面因心有余悸，只出一期便停刊了。《新社会》以及后续《人道》的停刊象征着以“文化启蒙”为中心的社会改造运动难以为继，而造成这场改造运动走向末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郑振铎在第3号《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文中强调文化运动的事业“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功效很慢，又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这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之唯一方法，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捷径可寻的了！”并且预期“不到十年之后，我知道中国的社会，必定比现在大不相同，改造的目的，必能完全达到了！”^[4]当时陈独秀也赞成郑振铎的观点。然而信誓旦旦、积极稳妥的思路并没有维持多久，第9号《再论我们今后的改造运动》中他已经意识到：“这种空谈的偏倚的社会改造运动的趋势，更是一天显明一天呢，有难能矫正的样子。长此以往，我恐怕我们的社会改造运动，不惟不能得有效果，并且有‘昙花一现’，难于持久之忧乐！”^[22]这种转变表明知识分子最初对社会改造抱有长远的决心与打算，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不容许他们做长期的计划，加上外界“纸上谈兵”的质疑，他们不免焦躁不安，很难再潜心践行他们文化改造的理想。早期的勃勃雄心到急功近利，知识分子心态转变是导致社会改造运动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知识分子心态的转变是由于他们渐渐发现了当时的社会改造运动的虚妄性，随着对西方社会革命以及理论的接触与研究，他们越来越觉得温和的社会改造运动并不能解决当时严峻的社会问题。郑振铎在创

刊号中言明他们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反对“效法德日的军国主义”、反对“以暴易暴”。^[9]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他们改造手段渐渐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反对暴力革命、远离政权到最终接受社会革命以及期待有组织的运动。第5号郑振铎还肯定新村的组织是“实行泛劳动主义的惟一方法，亦是新社会的基础。”^[23]到11号便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新村运动：“过于温和，偏于消极保守”，而绝对没有直接的社会革命“有大影响，传布的快”。^[24]17号在《中国劳动问题杂谈》中提出中国工人的罢工缺乏“固定的组织”。^[25]第9号瞿秋白已有倒向马克思主义的苗头：“一方面再换方法去试验，一方面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直接运动如其要细讲，步骤多的很，文化最低的地方也可以有，文化最高的地方也可以有。”^[26]而到18号，瞿秋白已经彻底发生转变，对社会主义有了朦胧的憧憬：“托尔斯泰式的生活是我们安心的生活，伯伯尔式的方法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他已经明确认可伯伯尔通过“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27]来改造社会的方法。这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同时期《新青年》的社会主义成分亦愈来愈浓，民国十年以后，《新青年》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最终倒向激烈的社会运动。1935年10月，梁漱溟在《我们的两大难处》的讲演中诉说这一苦衷：“即说是社会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依靠政权。”然而，“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这是一个矛盾。”所以，“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28] (P573)}依附性是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特点，王富仁认为“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在其根本意义上就是否定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29]在古代，士大夫依附皇权，在政权之下做些修修补补的事宜，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依附之路被打断，军阀割据使得知识分子无所依托，社会重心难以建立，而他们自身由于学术渊源、知识结构、社会方案等等的差异很难统一起来，试问他们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现代知识分子想仅仅凭借一时的文化热情来改造诺大的社会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而且当时知识分子所谓的社会改造无非就是成立一个团体，然后办一份报纸，做做宣传工作，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真正地启发“民智”。“现在什么改造，解放，各处都说的很热闹。可是，他们都是纸上的文章。见之实行的有几个人？不信你看现在各地新产生各团体，会办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所首先筹备的就是出版杂志。他们的全力，差不多就是聚到这一方面去了，好像他们的团体，是专为出版杂志而产生的一样。”^[30]郑振铎言：“因此我对于现在我们大家群趋于文字的宣传事业的现象，实在有些不敢赞成。”倡导

“我们应该分散到各省各乡镇等地方去做我们的社会改造运动,而不可以集中于一隅”^[22]然而“晚清以后,精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之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乃至关系上的疏离。”^{[1](P23)}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倡导去农村、去农工中间传播新知识,而最终却收效不大的真正原因。城市化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很难回到农村,去做实际的工作,这也印证了章太炎对“兴新学”的担忧,他认为都市生活会使负笈城市的“乡邑子弟”变得“慕富贵患贫贱”,^{[31](P79)}新学大多设立在繁华的都市,知识分子一旦熟悉了城市生活,还有谁会愿意深入农村去启蒙“民众”?从而导致社会改造运动成为了“纸上谈兵”的事业,难怪郑振铎认为社会改造只能改造知识阶级的人。

另外,知识分子的启蒙悖论是这场社会改造运动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地方。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主体,然而他们却以“阶级”学说与“劳动神圣”的观点不断地解构、消解自己的主体地位,逐渐认同下层被“启蒙”者。《新社会》旬刊第2号瞿秋白的《中国智识阶级的家庭》一文虽然批判的对象是传统的士大夫,但是他已经将天平偏向了下层劳动人民,后在《智识是赃物》一文中用阶级学说论证出“知识就是赃物,财产私有制下所生出来的罪恶。废止智识私有制就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32]并呼吁用泛劳动主义去除智识私有制。郑振铎在讨论自杀问题时提

出用“泛劳动主义”减绝知识阶级的“自杀事件”,^[23]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而形成一种自卑心理,认为自己与劳动阶级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加上当时的各种学说如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都非常注重劳动、关注下层人民,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抨击“不劳而获”,故知识分子不断地将自己放置到“神圣”的祭坛进行自我剖析,他们在情感上逐渐认同下层民众。试问,这样的心态如何去完成“启蒙”民众的巨大任务?他们只能最终被民众所“启蒙”,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也为这个群体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五四”前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派生物,知识分子是这场运动的主体,他们借鉴、吸收了西方各种的学说与理论,他们也具有改造社会的饱满热情,然而这场改造运动却如“昙花一现”般绚烂而又短暂。原因在于中国日渐逼仄的内忧外患一时间让知识分子无所适从,既想做长远计划,又想尽快解决问题,焦灼的心态混同士大夫的依附心理以及知识分子群体自我批判的启蒙悖论决定了他们只能放弃“文化”救国的梦想,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放弃文化改良方案转向马克思主义只是当时的社会主流,那些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仍然在默默地耕耘,然而,时代的主题确实改变了。

参考文献:

- [1] 许纪霖.导言·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A].许纪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C].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
- [2] 耿济之.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J].新社会,1919,(2).
- [3] 郑振铎.发刊词[J].新社会,1919,(1).
- [4] 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J].新社会,1919,(3).
- [5] 新社会广告[J].新青年,1920,7(6).
- [6] 本报启示[J].新社会,1920,(16).
- [7] 郑振铎.社会服务[J].新社会,1920,(7).
- [8] 耿匡.其二[J].新社会,1919,(5).
- [9]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 [10] 瞿世英.妇女解放的第一步(续)[J].新社会,1919,(3).
- [11] 瞿世英.学生运动与社会改良[J].新社会,1920,(16).
- [12] 耿济之.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J].新社会,1919,(1).
- [13] 刘军宁.回归个人:重申个人主义[A].余英时.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 [14] 张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A].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1986.
- [15] 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J].新社会,1919,(3).
- [16] 郑振铎.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J].新社会,1920,(120).
- [17] 瞿秋白.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J].新社会,1919,(4).
- [18] 郑振铎.什么是劳动问题[J].新社会,1920,(17).
- [19] 许地山.劳动底威仪[J].新社会,1920,(18).
- [20] 郑振铎.郑振铎启事[J].新社会,1920,(19).
- [21] 瞿秋白.饿乡纪程[A].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三卷)[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22] 郑振铎.再论我们今后的改造运动[J].新社会,1920,(9).
- [23] 郑振铎.其三[J].新社会,1919,(5).
- [24] 郑振铎.现代社会改造运动[J].新社会,1920,(11).
- [25] 郑振铎.中国劳动问题杂谈[J].新社会,1920,(17).
- [26] 瞿秋白.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J].新社会,1920,(9).
- [27] 瞿秋白.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J].新社会,1920,(18).
- [28] 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A].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29] 王富仁.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散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5).
- [30] 郑振铎.纸上的改造事业[J].新社会,1920,(8).
- [31] 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A].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32] 瞿秋白.智识是赃物[J].新社会,1919,(6).

[责任编辑 阳玉平]